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戴秉国

专论

对中美两个大国而言，只有走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唯一正确的选择。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一、中美为什么必须走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实际上已经结成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大家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面对各种各样共同的、复杂难解的新问题、新威胁、新挑战，没有哪一家能够单独应对。地球村里各家各户，特别是中美这两个“大户人家”，必须要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应对，绝不能成天吵吵嚷嚷、争吵不休，更不能打架。当今世界，武器的发展达到了惊人的尖端水平，而且数量上堆积如山。中美都是有核国，常规尖端武器也不少。如果中美两家开战，没有谁是赢家，结果只能是相互摧毁，还将殃及世界。人类经历的战争灾难够多的了，再也经受不起新的更具破坏性、更加惨烈的世界大战了。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谁也不愿犯下滔天大罪，成为殃及全人类的千古罪人。

在21世纪，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没有谁能取代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衰落不了；第二，没有谁能阻挡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既造福中国人民，也是贡献给世界、贡献给全人类的。中国发展起来，美国是最大受益者，中国不发展，陷入贫困、动荡、混乱，才对美国最为可怕。奥巴马总统最近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中国是一个由五千年文明滋养起来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家。我们不谋求霸权，就想中国的老百姓生活的好一点、世界平安一点，所以美国用不着怕中国，而应该敞开胸怀来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美国有什么理由不最大限度地发展同中国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中国发展给美国带来的红利呢?！如果对中国采取遏制、打压甚至大动干戈的政策，那就大错特错，是傻瓜才做的事情，等于做一笔最大的赔本生意。正如约瑟夫·奈教授所说的，将真正导致“美国世纪的终结”。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那么，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

我相信，是走得通的。

从世界发展史看，“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铁律，历史上也有很多避免冲突的先例。二战结束70年来没有打世界大战了，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中美两国不仅应该，也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来携手跨过这个所谓“陷阱”，创造历史，走出一条新路来。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看，45年前，当两国老一代政治家一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时候起，实际上就奠定了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尼克松总统讲：“我们将进行一次不仅为我们这一代人谋求和平，同时也是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谋求世代和平的旅行”，“中美有分歧，但可以找到共同点，找到双方都保障安全、实现发展、各走各路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寻求某种办法，使我们有分歧但不至于让中国成为我们战争中的敌人”。周恩来总理说：“中美两国的分歧不应妨碍中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可见，那个时候两国的政治家、领导人，就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了目标、方向、框架，这非常了不起。

这几十年来，中美两国走的基本上就是老一代政治家所规划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虽然一路走来有风风雨雨，但中美关系始终是向前发展的。到了今天，两国关系发展到了几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像到的高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中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国家关系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充分说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历史性会晤，就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战略共识，在21世纪新的形势下进一步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根本目标和方向，确定了根本框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达成的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共识，它是两国老一代政治家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双方领导人、战略界多年来深思熟虑、耐心坦诚沟通对话的结果，是人类历史上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是深得世界人民和中美两国人民欢迎的一个重大决策。中美两国都是重诚信的国家，一定会信守承诺，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二、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动摇、不退缩、不转向

那么，当前和今后长时间，应该怎样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呢？我的想法是：

第一，中美两国的一代一代政治家一定要咬定这个目标，排除万难，坚持不懈地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动摇，不退缩，不转向，而且要引导两国民众越来越多地理解、支持、参与到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来。通俗地讲，发展中美关系应该“上不封顶、下要保底”。“上不封顶”就是说两国合作能发展多好就发展多好，当然有一条，我们不结盟；“下要保底”就是说两国一定不能有冲突对抗，不能打冷战，更不能打热战。

第二，中美两国领导人和外交团队需要保持和加强及时而深入坦诚的战略对话与沟通，增进相互信任，避免误解误判。美国要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战略意图，不要把中国做的事情都看成是对美国的挑战，好好地发展同中国各方面的合作关系。中国要清醒认识自己现在是并且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谋求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双方应互相把对方视为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对手和敌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没有先例可循，有些人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不通可以继续想，双方也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极少数人想要否定、推翻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两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这些人应该明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美国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我曾跟美国朋友讲，你们不要不识货，历史上有哪一个新兴大国像中国这样，主动提出来跟守成大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向英国提出过吗？所以想否定和推翻这个共识的人应该改变立场，支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同中国沿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走下去，而不要等到“失去中国”才追悔莫及。

总之，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困难是不少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三、携手加强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大政方针没有变化，保持了继承性连续性，同时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近年来的外交工作始终着眼于一个根本战略目标，就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打一个好的基础。

至于说是不是放弃了韬光养晦，首先要回顾一下韬光养晦这一思想是怎么来的。据我所知，当年苏联解体后，国际上有些人找到中国，说你们是不是来当头、扛起旗，带着我们干。邓小平先生说不行，我们不当这个头、不扛旗、不称霸，埋头做好自己的事。做好什么事呢？就是发展好经济，把国家建设搞上去。大体上，这就是韬光养晦思想的由来，并不是一个什么阴谋诡计。

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不结盟、不扩张、不称霸，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坚持搞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这些就是韬光养晦思想的体现。习近平主席近年来遍访五大洲，走到哪儿，这些思想讲到哪儿，而且我们不仅这样讲，也是这么做的。

有人认为中国“咄咄逼人”，我想，咄咄逼人的绝不是中国。中国只不过做了一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不做的，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事情。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为亚洲和世界做了很多好事、善事，比如推动建立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这是不是善事、好事，造福于大家呢？中国致力于促进世界的稳定与繁荣，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亚太地区是全世界都非常看中的一个地区，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地区，千万不能把它搞乱了。对亚太地区来说，中美合作非常重要。我们尊重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亚太合理的、不断增长的利益。两国应继续加强合作，并同整个亚太地区国家一起合作，共同维护这个地区的太平。

中国致力于同美国携手加强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不当“造反派”，不谋求另搞一套。记得当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布什总统提出要召开G20峰会，中方很快就表示支持，一个新的G20峰会机制就这样诞生了。我们本着同舟共济、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精神，致力于同美国发展各方面的合作。比如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对美国落井下石，而是跟美方一起共渡难关。我们还致力于同美国在朝核、伊核、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国际问题上开展有效的合作。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不负责任的国家。

毫无疑问，中国要有作为，不作为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搞霸权外交，不搞国强必霸，而是国强不霸，也不搞耻辱外交，不会像鸦片战争之后那样，跪在地上办外交，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我们都善待他们，但他们也要善待我们，大家和谐相处。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的讲话，本报有删节。）

理论在线

融入“一带一路” 实现开放共赢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化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我国加快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指明了方向，为沿线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提供了机遇。在“十三五”实践中，我们要深刻领会经济新常态下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将这一重大战略构想落到实处，让开放共赢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一、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功能

首先，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保持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下的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一个关键是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通过大开放，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拓发展空间。“一带一路”作为对外开放的总抓手，将使我国从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从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的态势转变，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基础上，使中国内部市场一体化提升为欧亚非大市场，从而创造出巨大的有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

其次，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既可以带动国内外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清除障碍。

第三，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创新驱动。在构建互联互通网络的基础上，建设“一带一路”将提供更多的产业技术交流的平台，国家间技术交流也会步入一个新高度，推动我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建设“一带一路”也有利于我国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等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各地都应以此为契机，拓展产业技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加大高新技术的引进力度，利用产业转移的空间加速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

第四，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互利合作共赢。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这一传统分工格局，价值链的一体化、生产的分散化、营销的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建设“一带一路”可推动与沿线国家实现互利合作共赢，共同设立产业集聚区，既有利于提高我国能源资源保障水平，又可以把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带出去，把优势产能转出去，把重要技术标准推出去，为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拓展更大空间。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需处理好的辩证关系

第一，处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培育业态新优势。我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外贸产品结构中的一些问题也不断显露。进一步提高我国出口产业竞争力，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注重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建设，注重培育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出口商品。一方面，要“求新不恋旧”。产业基础比较好的一些地方不能吃老本，应积极求新思变，抢占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智能制造等新兴业态发展先机，注重在服务领域如电子商务等产业中，努力发掘新增长点。另一方面，要“喜新不厌旧”。一些传统出口产业是我们的家底，总量大、吸纳就业多，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对有比较优势的服装、陶瓷等传统产业要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创新科技、产品、管理、商业模式，在提升改造上下功夫。

第二，处理“实”与“虚”的辩证关系，增强投资新优势。建设“一带一路”，要优先从“实”的硬件进行投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交通建设规划对接，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同时，还要注重从“虚”的软件进行投资，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坚持弘扬和传承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第三，处理“出”与“进”的关系，形成互补新优势。在“出”上，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创新“走出去”方式，鼓励链条式转移、集群式发展、园区化经营，推动同行业企业实施差异化经营，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规模效应。在“进”上，要更多转向注重引进外资质量，把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外资引进来，特别是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引进研发中心、交易中心、营销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坚持引资与引智并举，通过引进高质量的外资，带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高端人才。

第四，处理“点”与“面”辩证关系，构建联动新优势。建设“一带一路”要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上海自贸区成功试点之后，加紧推进天津、广东、福建等第二批自贸区建设，通过发挥试验示范作用，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点”上下功夫之外，还要关注开放的“面”。西北地区主要发挥新疆、陕西、甘肃等地的区位、经济、人文优势，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建设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西南地区主要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独特优势，着力打通陆上连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并与长江经济带有机衔接，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中部等内陆地区要利用腹地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合作互动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内陆型经济开放高地。 （执笔：戴启文）

多措并举扩大国内消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依绍华

学术经纬

近年来，随着公民出境旅游的快速增长以及海淘、代购等新型购物方式的兴起，中国消费者在海外消费增长迅猛，充分显示出国内居民强大的消费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内消费。应深入研究解决相应对策，多措并举，既能让国人买到心仪商品，又可以不需舟车劳顿到海外购物，从而不断扩大国内消费。

其一，扩大进口消费品比重，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度。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加速，国家加大进口力度，消费品进口增长较快。2015年我国进口总额尽管下降13.2%，而消费品进口增长仍然较快。但由于消费品占总进口量的比重仍然偏小，难以满足国内居民的旺盛需求，因此应进一步促进消费品进口，提高进口便利度水平。包括建立消费品进口网络服务平台，实行在线实时监控，加快通关速度，缩短国内、国外新品上市时间差；规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管理，创新监管方式，推动上海、广州、重庆等10个跨境电商保税进口试点城市探索跨境电商保税进口新模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商品流转率；鼓励企业加大进口采购力度，与国外消费品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吸引国外企业到国内开展促销，并逐渐建立买手制，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引导外贸企业加大进口贸易，利用国外经销商资源，培育进口贸易公共平台，为中小流通企业服务。

其二，调整高档消费品消费税范围，减少国内征税环节。国内外高档品牌商品存在较大价差，是居民选择海外购物的主要推力。2015年以来，我国已逐渐降低部分日用品关税，但还有很多商品未纳入其中。建议继续调整现行征税范围，采取按照到岸价格分级征税方式，在此基础上，减少流通环节征税并适当减税，降低各类收费额度，减轻企业负担，提高消费者福利，扩大内需。

其三，提高国内产品供给质量，提升消费满意度。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长，对商品质量和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但国内一些产业产品质量和档次尚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为此，应提高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产品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比如，推动制造业升级，将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利用大数据分析终端需求的变化趋势，感知细分市场下的消费热点，进行个性化设计、柔性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标准，逐步将中高端消费品质量标准提升至与发达国家一致，同时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在营销战略、售后服务及物流配送等方面提供保障，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满意的产品。此外，还要鼓励国内企业参股、收购国外中高端商品品牌，大力培育自有品牌，建立消费阶层中的文化归属感，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质的提升，引导国人更多消费国产品牌。

其四，完善产品质量保障体系，改善国产商品形象。近年来，国内产品质量问题频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亟需完善质量监督体系、强化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提升公众对国产商品质量的信心。建议出台较为全面的产品质量监督制度，并将一些已施行的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强化法治监督和惩罚力度。包括完善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构建联合监管机制，覆盖市场监管和质量认证程序中存在的管理“空白”；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明确抽查范围并建立抽查结果公示制度；全面实施问题（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加大政府在缺陷产品召回中的权力以及对违法者的惩处力度。

其五，构建监督惩罚体系，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在国内消费，应大力整治不法分子的行为，提高其违法成本，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一是加大对不法企业和从业者的处罚力度，采取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同时可加重刑事处罚力度，将生产和提供不安全产品的行为视为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在行政处罚的基础上，给予严厉的刑事制裁，震慑生产者、销售者对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引入媒体和公众监督制度，鼓励媒体从不同角度对质量违法企业及产品进行曝光，并对问题产品处理结果进行跟踪报道，加大企业在商誉上的制假售假成本。要简化消费者维权程序，降低维权成本，针对目前维权“成本高、程序复杂、不方便”等问题，尽量简化维权程序，提高处理消费者投诉效率，增强维权效果，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引入法律援助制度，鼓励消费者采取法律手段维权，扩大维权力度，提振消费者的维权信心。